深化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认识

■张首魁

【提　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安排，是我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合理性思想，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目的性体现在满足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突破重大科技工程组织方式、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需要。合规律性蕴含着权威政治的组织逻辑、赶超战略的目标逻辑、政府与市场合力的行为逻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治理逻辑。实践中，必须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合力、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

【关键词】新型举国体制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实践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G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22)12-0044-07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22.12.007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发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作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1]。党的二十大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是新时代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学实践，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选择，是发展目标与发展手段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合理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制度创新，具有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合目的性、实现手段的合规律性，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实践统一。

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合目的性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实践价值，应立足于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的新发展格局构建，从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必要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任务性质与攻关组织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条件等方面去认识和把握。

（一）关键核心技术是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的需要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习近平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2]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新型举国体制以统筹国家发展和安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新发展格局提供保障和支撑。纵观世界大国崛起，关键核心技术是技术变革支撑国家飞跃发展的关键，更是立足世界、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的强力支撑。关键核心技术已经成为在技术上、经济上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节点。习近平强调，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只有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只有通过科技创新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才能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才能以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放眼未来，世界技术和产业发展处于变革期，机遇和挑战并存，要在激烈的科技竞争中抢占战略制高点、掌握发展主动权，仍需锚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在政治层次上定义的，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的科技攻关。体现的是国家战略、代表的是国家利益、影响的是国家发展、收益归于全体人民。只有当关键核心技术在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对国家安全形成挑战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必要性紧迫性才会被凸显出来。“举国体制”是解决国家利益需求所带来的实际问题并产生最佳集体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效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政治利益等隐性利益方面。科技创新领域的“技术外溢”更是产生大量的、不可估量的经济意义上的产业价值。重大科技创新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与经济动员的结果，而且是政府基于国家使命的财政科技投入、政府市场化采购激励的结果。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仅关系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安全可控，而且会进一步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诞生新的产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社会福利效应巨大。

（二）举国体制是突破重大科技工程组织方式的法宝

举国体制是重大工程的有效组织方式，在我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历史使命、表现形式和作用发挥。新中国成立后，规模宏大的科技工程、重大技术突破的成功，是举国体制组织方式的有效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的是复杂科技工程问题，需要用针对重大复杂科技工程的组织方式来实施。嫦娥系列任务、北斗系统工程，其在实施中建立了“集中统一、高效协调”的组织实施体系，将政产学研等多维力量有机整合，实现管理—工程—技术的有机融合。[3]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能仅依赖于特定行动者，更依赖于经济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集中协同发力。中国卫星导航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成功，是由国家投资建设、决策管理、统筹多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和市场力量，广泛组织和配置资源完成重大科技工程的方式，得益于国家重大工程组织方式的保障[4]，是“党和国家调动千军万马干出来的，是工程全线几十万人团结一心拼出来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定支持共同托举起来的”[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6]。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国从“两弹一星”到“嫦娥奔月”等一系列巨大成功，重点领域不断取得突出成就，无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以组织方式为手段提升重大科技创新效能，将我国政治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正如习近平指出：“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7]新型举国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整合国家战略科技资源、各类市场主体资源和社会机构力量，以协同攻关的方式实现物质资源和精神意志最大限度地统一，实现“全国一盘棋”的资源整合以及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8]

（三）新型举国体制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调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旨在实现重大突破和重大创新，不是配置已有资源，而是创造原来没有的资源和能力。[9]市场机制不会自发产生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存在以“市场失灵”作为政府介入资源配置的理由或依据。依靠传统举国体制不仅难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高效化，也容易造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的效力发挥，甚至可能会导致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双重失灵”。因为无论是市场配置资源、还是政府配置资源，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局限，那就是只能配置已有的资源、或已知的资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基于已经积累的资源和能力，创造潜在的资源和能力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举国体制的重大任务必须是由政治层次上决定，不能由市场来决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要突破政府与市场二分法，发挥国家组织者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共同作用，以更加开放的方式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资源配置提供了可行性安排。新型举国体制不同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不是命令式、运动式的发动全员，而是战略性地集中优势力量，攻克重大项目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发挥市场与政府的合力，科学解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要的资金投入、技术资源等必要条件，推动公共力量与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合意性整合。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核心在于市场主体的投资预期与市场收益。关键核心技术投资额度大、周期长、风险大、不确定性强，但所创造成果的溢出效应显著，相比于在现有产品技术基础上的改进型技术进步，企业的投资意愿大大降低。新型举国体制兼顾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国家主导下运用市场方式解决国家科技创新工程中的重要问题，将资源有效整合到战略性重大科技创新工程，使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澎湃动力。

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合规律性

合规律性是实践合理性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认为，真正合理性的实践必须要遵从规律性。从实践理性的视角来看，合规律性是从实践的目的到实践的手段、实践过程都要符合客观规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尽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体制[10]，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创新实践。

（一）组织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蕴含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然存在权威，为举国体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11]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提出了国家发展阶段的跃升对权威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2]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13]。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内必然存在权威，也是需要权威存在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通过对国家政权的掌握，“组织一切被剥削阶级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14]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恩格斯明确地指出随着生产的集中，组织和管理也应该由放任自由变为权威和集中。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所需要完成的目标任务，需要国家作为强有力的组织者来实现突破。新型举国体制强调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导，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突破传统举国体制下的行政命令式治理，区别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动员式”治理，主张以多种现代化治理方式动态互嵌的多元化的治理机制安排[15]，建立在权责清晰、制度规范、主体多元、机制有效的治理框架下[16]。举国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是一种针对特殊领域特殊问题解决而采取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协调规则。我国在科技领域的“新型举国体制”，意味着国家行为人对科技创新价值的取向放在政治效应与国家利益上，从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要举国来办。

（二）目标逻辑：赶超战略

面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发挥关键核心技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和支撑引领作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目标属性在于实现国家科技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是一种国家赶超战略。发展经济学的赶超理论为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理论合理性。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发展不平衡、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其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理论，本质内涵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就是创造一切条件，变劣势为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的资源优化、技术跨越、制度捷径的有利形势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结构主义强调，发展中国家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赶超，应当在动员可能使人们参与当地的发展过程中起积极作用。[17]国家可以利用国家能力组织资源、配置资源，获取规模经济、实现赶超突破。赶超战略理论认为，国家干预不仅提升国家能力，而且通过“溢出”扩大市场主体投资，最终通过创造供给能力、创造需求空间，提升国家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能力。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仅是一种技术挑战，更重要的是加速技术突破并推动技术、产业领先，“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跃升”[18]。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走好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才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把握发展主动权。习近平在总结国内外科技发展规律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非对称”赶超战略。我们在科技方面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新中国刚成立时，在“举国体制”推动下，从近乎空白起点基础上，采用赶超战略、在极短的时间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新时代，通过各方力量有效协同，迅速形成较为完备的现代科学技术创新体系，并取得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成功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是中国共产党本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对科技创新持续推动和有效治理的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具体体现。[19]

（三）行为逻辑：政府与市场合力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行为。“举国体制”强调党的领导和国家集中决策、政府政策引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国家对经济行为的干预。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但资本主义市场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市场对资源配置经常显示出盲目性。列宁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观点，并强调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生活本身“要求国家的干涉”，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代表，不得不求助于国家直接出面“承担为生产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从不同层面阐明了政府活动的意义，在实践上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撑。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各类重大科技、重大工程的组织化程度要求越来越高，各国为调动各方资源形成集中力量，普遍以国家组织和社会动员、市场激励等方式协同来实现突破。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采取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运用中国特有的“举国体制”，使中国站立在世界东方。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社会主义新道路，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是一种国家科技战略安排，目标就是改变技术创新的机会边界，由关注有效资源配置向关注创新机会和技术能力转变，从而使得跃阶式的技术突破成为可能。演化经济学认为，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多角度替代性冲击导致企业创新能力陷入困境，难以按照既定技术路线开展创新，导致技术范式变革出现延迟或遭到破坏。结构主义反对关于公共工程势必“挤出”私人投资的说法，认为恰恰是公共工程借助于互补作用而“挤进”私人投资，从而实现比私人投资更宽广的效益。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集中决策、政策激励、主导推动作用，动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稀缺资源向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目标领域配置，是一种组织化协同攻关的制度安排。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将政府力量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四）治理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坚持党中央统一领导是新型举国体制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新型举国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创造性地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促进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20]中华传统的举国体制是适应人类改造自然谋求生存而形成的。新中国建设时期，在极匮乏的物质技术条件下，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较短的时间突破“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创新工程，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体现了举国体制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不仅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同时也汲取了中华历史演进中应对重大工程和风险挑战的积极经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到如今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昂首挺立于世界大国之林，国际地位与综合国力举世瞩目，“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功不可没。新型举国体制既区别于传统举国体制下的动员式治理，也区别于自由市场经济的采购式经济利益刺激，主张以常规式治理、动员式治理动态互嵌的方式推动国家治理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其目标是形成权责清晰、制度规范、主体多元、机制有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21]新型举国体制不仅是对以往举国体制过多强调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的超越，而且具有使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的“新制度优势”。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的提出，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实践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新型举国体制的运行和实施提供经验支撑。实践表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紧密的互动，保持其系统内部不同主体之间的有机协同是实现有效科技治理的重要前提。[22]但各参与主体拥有不同的目的，分属于不同的机构，如何通过创造合适的技术支撑系统和有效的制度安排，促使分布在各参与主体内部的知识在系统内部流动，并将产业和科技基础联结起来，需要“举国体制”来实施相应的国家干预，需要有作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有作为的国家政治领导层来决策、推动。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一种国家突破重大项目的组织方式，不等于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的。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新型举国体制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实践合理性思想指导下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

（一）坚持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

回顾历史，正是中国共产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才有了中国科技和产业飞跃。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拓展，迫切需要关键核心技术的引领和支撑。坚持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是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实现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根本保证和治理特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体现国家意志、属于国家行为，需要权威的领导和国家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广泛动员一切力量，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共同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新型举国体制的“行动逻辑的核心要义表现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开展举国范围的协作以达成最终目标”[23]。党中央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决策上发挥“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国家发挥好组织者的作用。

（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资源支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从战略上解决国家发展和安全重大问题的，能够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落实国家战略。要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共同构筑力量互为补充又各有侧重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在国家战略科技资源配置中，要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国家层面强化国家战略需求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资源聚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建设一批国家科学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际科技研究中心等基础研究基地和创新合作交流平台。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相关科研机构、以及技术需求方在确定目标任务、攻关实践和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的主体作用。

（三）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习近平针对科技创新领域多次强调，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政府在财政科技投入、重大项目规划、科技项目分配等方面要发挥主导作用，由政府通过财政科技政策手段引导各类科技资源力量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集，实现多领域、多区域、多元主体的协同作业。[24]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上，采取政治约束下基于市场机制的任务体制，按照复杂工程项目的方式来组织攻关，通过国家规划、重大工程引领，在明确协同目标的基础上分系统、分标段落实。通过专项投资、“揭榜挂帅”、契约合约、采购承诺等竞争择优的市场手段，激励科研院所、高校以及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建立一种良性的合作竞争格局，形成“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四）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研发，一定要坚持开放创新”[25]。科学技术本身具有世界性、时代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科技自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立自强与科技开放合作是并行不悖、辩证统一的，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这是科技发展本身的要求，也是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科技贡献的一个表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强调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促进独立自主地技术攻关与利用好国际科技资源相结合，强调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相协同、国际合作与自立自强的相互促进，使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新发展格局为集聚利用全球创新资源要素创造了条件，必须抓住全球科技创新加速变革的新趋势，塑造开放创新生态圈。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加快推进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提升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科技创新基地平台的国际合作交流水平，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搭建平台、凝聚力量。

注释

[1] 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004825838979893&wfr=spider&for=pc<

[2]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5/28/content_5294268.htm<

[3] 赵耀升等:《“北斗”闪耀—初探中国卫星导航产业发展之道》,《管理世界》2021年第12期。

[4] 盛昭瀚:《运用复杂系统管理思维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国家治理》2020年第47期。

[5]《中国的北斗 世界的北斗》，人民网。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609858301972773&wfr=spider&for=pc <

[6]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

[7]《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科技创新的几个重要论断》>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0/0628/c428053-31762012.html <

[8] 张翔、刘苏:《“动员激活常规”：新型举国体制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与评论》2020年第4期。

[9] 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管理世界》2021年第7期。

[10] 何虎生:《内涵、优势、意义：论新型举国体制的三个维度》,《人民论坛》2019年第32期。

[11]董成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显著优势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21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

[15] 陈劲、阳镇:《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论逻辑、落地模式与应用场景》,《改革》2021年第5期。

[16] 黄建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8期。

[17] 梅俊杰:《在赶超发展视野下重新解读李斯特经济学说》,《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18]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22/0112/c435113-32329501-3.html<

[19] 蔡跃洲:《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科技创新的领导作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20]《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609/c64094-25125270.html<

[21]黄建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8期。

[22] 俞可平:《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当代世界》2014年第10期。

[23] 谢富胜、潘忆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

[24] 雷小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研究》,《经济学家》2021第5期。

[25]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作者为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校[院]务委员、教育长、教授）

责任编辑 陈景彪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